

就在中秋时分,还和范敬宜先生通过一次电话的,问他好吗?他说不是太好,近日还要去医院看医生。声音里有些许无奈但无异样,还和我聊了一会儿社会和国家的闲话。

想好过几天再问问他健康状况的,打了几次电话没人接,想想也许是时间太晚的缘故,尽管范先生平时说自己是“夜猫子”,12点前一般不会休息……直到13日的傍晚,想再打的电话还没来得及打,上微博的朋友传来范先生辞世的消息,让我极度的震惊和痛惜!晚上就给范先生夫人吴老师打电话,她的悲痛可想而知,吴老师接起电话,然后她的儿子接续告诉我:

在今年年初,发现胆囊癌症,晚期,已无法手术,8月份和10月份都住院治疗。最后的时刻,倒是没有想到会在今天,是因为骤然的心律衰竭,抢救无效……

永远的谦逊

范先生的儿子对我说:《敬宜笔记》专栏和结集的两本书,是我爸爸最喜欢的自己的作品。他还说,你作为专栏编辑,对他帮助很大,还有报社的支持,我们都特别感谢……我一时感伤惭愧得说不出话,只是说了:是范先生帮助我,《夜光杯》有他的文章是版面的光彩;他的专栏和书,有很多读者。我心里为此一直存着对范先生的感激,未及说出,如今却已来不及告诉范先生了。

多年来,他在文章中多次感谢并提到我和报社,而我只把深重的感恩放在了心里,常常以一声谢谢表达我的心声。他在《敬宜笔记》专栏结集出版时,传来一篇对我如何当编辑多有赞赏的文章。我退了这篇稿,对范先生说:“这篇不行,我要毙稿啦!”他不无遗憾又很善解人意地说,那就重写一篇吧。后来他写了《五年·百篇·四谢》,文中四谢是:一谢我们改革开放的时代,二谢新民晚报领导的慷慨,三谢广大读者的鼓励,四谢责任编辑的盛情。

文如其人。范先生的文章写过很多名家大家,不少都洋溢着感恩感怀。文中人物有孩提时仰慕的长者名宿,成人后交往的社会贤达与政界要人,比如:唐文治、叶圣陶、王佩诤、吴丕绩、顾廷龙、吴湖帆、柯灵、于谦、季羨林、钱学森、费孝通、任仲夷、许嘉璐、成思危等等……同样的,他也写很多生活中的普通人和社会上大事小事。

他对人永远是温和的。他的朋友、同事和熟人,评价他真是一个十分儒雅的人,虽然长年有不低的官衔,对下属说话永远是商量的口吻,用慢柔的普通话或带点糯软苏州味的上海话。两大中央报纸,在上海都有分社,他作为总编辑,总是很愿意与分社同人随便聊天,吩咐工作也是平等的。

晚年的乐事

我开始约范敬宜先生写稿,他还在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任上,文章是陆续散登的。后来他离任了,即上世纪90年代的后期,我萌生了请他写专栏的想法,之前怕他会太忙,现在或许可以松动一点,虽然他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。为了约成专栏,我事先想了两个栏名《蓝色笔记》和《敬宜笔记》供范先生参考。后来我们电话商定用后者。我曾稍有惋惜地想过,为什么不请他自己想一个呢,那一定更好。后来,专栏效果很好。我想也是,用名字作栏名,虽然敬宜不仅仅是名字的意思,字面含意也好,但范先生大概是不会往自己名字方面想的,才释然些。专栏的本意是要给读者读到当下的才子文章,组稿时,我与范先生说,希望他写自己的经历、阅历和各种感受,写他看到和交往的人与事,也具体说了篇幅和稿量,总之,短些轻松些。这位身居“高位”的作者,对“轻松”的理解在他的序言里十分精准:“对这类专栏所要求的轻松是:既要有点可读性,又要有

报人范敬宜

贺小钢

【作者简介】

贺小钢 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,毕业后一直在新民晚报副刊《夜光杯》当责任编辑至今。

点思想性;既要有点人情味,又要有点文化味;既要有点情节,又要有点情趣;通而不俗,雅而不酸。”

在人大工作比在报社空余时间会多一点,但时间还是要挤的。不过他告诉我,他写副刊文章感到愉快。他在一篇文章里也这样写了:“真的,写《笔记》是我晚年的一大乐事,一种难以言说的赏心乐事。”

我还感到,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范先生,另一件晚年的乐事是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,不仅当院长,还上几门课。他自己在五十多年新闻生涯中得出“丰厚的学养对新闻工作来说,实在是太重要了。当了记者,何以做到‘登山则情满于山,观海则意溢于海’,‘意授于思,言授于意’”。他总给学生开书单,希望学生向他提五花八门的问题,他告诉我,汲取青年学生的想法,也是观察社会的变化。

报人的素养

去年读到刚出版的《范敬宜文集·新闻作品选》,感悟很多。作为副刊编辑,读他的通讯评论,哪怕是“编者按”,都很有收益。我在电话里与范先生聊这本书,随意地说我的看法,通讯故事生动,评论多用春秋笔法,编者按更是现在大多数人不能企及的精品,我还谈到了新闻和新闻界的现状,比如自己写“编者按”,通常是干巴巴的,标签式的……不料有些话范先生要我重复一遍,我些微停顿赶快掩饰自己的一愣,继续说。他那么认真在听,好像还想起一下。可见他对小字辈的看重,对媒体现状的关心,对他作品反馈的认真。

90年代时,他寄稿有时是原件有时是复印件,基本都会留一信笺。后来有了传真机,就将稿件传过来了,但总有一信或者几句附言。按范先生与我约定,我收到文章会回个电话,每次文章发表会寄报纸,因范先生要在北京多预留两份报纸,刊登时间确定后会先打电话告知。但我羞愧很少短笺,不像范先生那样认真细致,礼数周到。

范先生的传真机是机关提供的,传真机给范先生带来了多方



范敬宜先生画《山水》(2001)



范敬宜先生书法作品

范敬宜先生书法作品



感慨:‘这世界变得实在太快了……再用老掉牙的语言确实已经打动不了网络时代长大的孩子了。’

文章于6月4日见报后,居然引起了一些共鸣,有的文摘报还作了转载。我暗自欣喜:看来我还算是比较开明的老头吧!”

便,刚用上时,他欢喜得就像小孩子得到了一枚玩具,要知道,这可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,一位部长级的官员!他没有太多的物质冀求,一个没有推掉的“礼物”,自然付给了精神的传送。

经常地,我们会在电话中议论一下文章,曾有两次我提出哪句不要、哪段换位更好些。议论时,有时是总约的,有时是具体的,自然有多有少。但他品味出来的是,说我,说好的是真好,不多说的是一般。其实,范先生的文章,篇章都是用心之作,每一篇都可以让读者有所得,还常有“神来之笔”。有时他听后,会说老吴说这篇好,那篇一般。可以充分感到,第一读者的吴老师,眼界是很高的。我觉得一位文章大家,也需要鼓励。别人的评论,在他看来也许就像成绩单。

也许他也觉得鼓励是必需的。在《夜光杯》创刊50周年时,他发来贺诗:创刊60周年时,挤出时间,赶来出席纪念座谈会,还特别写来文章《一缕幽香入梦来》,文中写道:“我喜欢‘夜光杯’这个‘朋友’……主要是不论在什么季节,什么气候,始终散发和保持着缕缕淡淡的然而醇厚和文化气息……”;在《新民晚报》创办70周年报庆时的上世纪末,他写《可爱的燕子》,写《新民晚报》的可贵是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专栏集子《敬宜笔记》和《敬宜笔记续编》分别出版于2002年和2007年。2008年之后,他基本没有再写专栏文章,那时多半苦于他的眼睛过敏,后来又因右眼有眼疾住院治疗。回想起来,整2009年里,只发来两篇文章。一篇是《范敬宜文集·新闻作品集》的序,一篇是我委托他为《严独鹤杂感录》写的序。当时报社同事严建平要我为他祖父的集子请范先生写序,我真有点为难,范先生因健康原因已不怎么写文章了。我无限犹豫地向范先生提了出来,不想他没有半点迟疑就答应了,我感动之后又深深的不安,总觉得给他添了麻烦。不久序文传来,标题是《独鹤可以不“独”矣》,我读后兴奋地说,放专栏用,又是一篇好文章。范先生很愉快:“老吴默认好,但只高兴地说了一句,你看着吧,小钢一定觉得好,会上版面的。”严建平也很感动地说:“祖父去世时,我还小,对祖父办报知之甚少,范先生的序文,让我对祖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。”我说:“是啊,范先生说你祖父是德高望重的报人,他很景仰。”

独特的官员

许多年来当一家省级报纸的副总编辑、两家中央报纸《经济日报》《人民日报》的总编辑,离开报界后,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,后又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。由于一直给人平易的感觉,许多人都叫他老范,我称呼他范先生,这也是我通常对男士的统称,不管有没有头衔,称范先生当然还有“老师”之意。他挺高兴,曾对我说,叫老范也行,都好。我想,他一定纠正过不少叫他范总的人。

有一次,电话闲聊中我说起很多场合会有人如约而同地感叹:现

在真正的报人太少了,但您范先生是一位。他显然很兴奋,他说谁谁谁也这样说。给范先生这样的评价真是一直延续着,不管他还在不在任。自1998年离开《人民日报》,他的新闻调查兴趣没有随着工作环境的变化有丝毫的减退。有一次去柳州考察,第一件事就是拜谒柳公祠,写了一篇专栏文章《谒柳祠,念公仆》,文章表露“前人评论他的文章‘深、雄、雅、健’,然而我崇敬的不仅是他的文风,更多的是他的政风,或曰‘官风’。”文章为此特意引用全文134字、在当地百姓口头相传的柳宗元《送薛存序入序》,为方便读者阅读,还做了白话翻译:

“作为一个地方官,他的职责是当好老百姓的仆役,而不是把老百姓当作仆役,因为官员是老百姓用赋税养活的。可是有的官员既不好好为老百姓干活,还要搜刮偷盗老百姓的血汗,而老百姓还不敢像对待家中手脚不干净的佣仆那样去处罚他、赶走他,岂不可怕?”

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官员,能有这种公仆意识,实在够“超前”了,难怪毛主席那么重视章士钊的《柳文指要》。

范先生还告诉过我,一次范先生正巧身边没车,自己打出租车上班,发现那是一个了解社会的途径,以后,就有意识地不时地坐出租车上班,《敬宜笔记》中《我与“的哥”常交往》就记录了这方面的趣事。

好像是在2002年,范先生到上海,住在虹桥宾馆。他跟我说,他早上给自己安排了一个重要活动,就是在附近找大饼油条糕饼。我说那是很难找得到的。后来他说,真是难找啊,最后终于是在拐来拐去,走了很多小弄堂之后找着的!还尝了豆浆和糕饼呢。言语之中,那么喜滋滋的。

范先生是很愿意和朋友们交谈、又是很喜欢看风景的人。他说他喜欢看奇特漂亮的房子和树叶飘飘的街景,所以,走路常常很有心情,这在他的不少文章里都有影子。

有一天传来一篇《飞车追警》,那是2006年,他75岁。我回电话说,可以想象您追赶时有多么的童心,很有趣啊。他说,因为怀念小时候在上海生活时街头的“烘山芋”,北方叫“大烤白薯”,所以溜达街头寻找,没想到,刚眼睛一亮,几辆烤白薯的自行车就呼噜不见了,赶紧追,好不容易追上买上了。他问自行车主为何如此慌张,知道是市容和卫生主管部门不让大家烤了。他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:

“我揣着三个热气腾腾的烘山芋,胜利而归。只是心里一直在嘀咕:这算是理由吗?城市里该治理的大事情多着哩,何必老跟那辛苦谋生的‘小小老百姓’‘较劲’?”他的文字常常不经意间就给我们重重的提醒。

范先生来上海,有时吴老师也一起来,但都很匆忙,他们总至少争取要请一餐饭,或者咖啡,为的是三四人可以随意聊聊天。有一次多年没回上海的范先生在饭桌上生动地“喔哟”一声,我以为哪个菜有问题,提起了心。他说:“这鲢鱼,我是几十年没吃了呀。”我放下了心,高兴起来,告诉他“这是现在上海很流行的菜,多年不见的鲢鱼从长江游回来啦,但野生的很少,大多是养殖的了。”他吃着,连连说好吃了。每次吃饭,他都会评价好吃的菜,那种热爱美食的情形真是令人愉悦。

范先生还是一位愿意和孩子对话的爷爷。记得有一篇文章叫《陪着孙辈一起长大》,文章的开头是:“一个月前,我给‘夜光杯’写了一篇《盼盼的‘逆反诗’》针对当前青少年中常见的‘逆反心理’发了一点

当年读初中的盼盼才13岁,时隔7年,如今都长大成人了……

范先生的书画,在我认识他之前,就听人说过,是当代人中真正道地的文人书画。他曾不止一次地说,想送我们一幅他的书法,内容由我来选。我迟迟没有给他,我心里知道,他有时忙得很无助,求书求画求序文的人多如流水,他应付都来不及,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,也觉得来日方长,等到什么时候范先生真正比较空的时候,再请墨宝也不迟。到如今,人去墨亦去,多么多么的遗憾啊。

时光的流失

十几年来,就2010年的一整年,范先生没有在《夜光杯》发过文章。今年春节,我们去北京探望岳父母,想找个时间与范先生见面聊聊。范先生曾几次跟我说,他家附近,新开了一家茶馆,你来北京,我们就可以到那里喝茶聊天。没想到,范先生说到那,范先生就不见了,我总不太舒服……那个时候,我非常理解,状态不好不见人很自然的,全然不知道他的病情。现在回想,那个时候,他的不舒服已很重了……

这一年,再回头看看,他的电话少了,我知道他状态不怎么好,就不时打电话问候,他一接电话,总是高兴地谈,常和老吴说起你呢,要给你打电话呢……

范先生人生坎坷,反右、“文革”均遭厄运,在辽西贫苦山区生活了十年之久。上世纪80年代初,才落实政策。1981年,他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日本,在飞机上写了一首七律:“东渡扶桑若梦行,排空驭气入苍溟。身凌群岛碎千叶,背负长天侣万星。汗湿青衫余赤胆,霜侵两鬓有童心。自怜去日多虚掷,再乞华年二十龄。”

这首诗是范先生《华年二十去如飞》一文的开头。他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:“……回到辽宁日报工作不久,既是第一次出国,又是第一次乘坐飞机。这次出访机会本来属于总编辑赵卓同志,他却把它作为一种奖励给了我这个小人,我的心情自然非常激动。”

第一次登上飞机,处处感到新鲜……贪婪地注视着窗外的一切……难免俯仰平生,百感交集,既痛惜失去的岁月,又憧憬未来的年华,于是从心底里跳出那么一句诗‘再乞华年二十龄。’

因为写此文时,已是2001年11月。所以,他还写道:

“为什么不多写几首新求天公再赐给二十年呢?当时想的是,只要能够追回蹉跎的二十年,就足够再拼搏一回了,到那时已是七十老翁,还有什么奢求?”

想不到后来的二十年,中国竟会发生那么巨大、精彩的变化!乱世苦夜长,盛世恨日短,一进入2001年,猛然意识到,预支的二十年快到期了,不禁悚然惊心,这时才体会到季羨林老先生为什么过了‘米寿’,还要‘相期以茶’。

我是从乱世走到盛世的,所以对盛世倍感可贵,倍感珍惜。”

是啊,多么热爱生活的范先生,他写到过:“如果天假以年,我还希望能出‘续三’、‘续四’……”

他还多次写上海,《老上海的“市声”》站在“早桥”看上海……

他的专栏文章,多篇获得“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”奖项,篇目有《曰归曰归未曰归》《感人即在平易处》……

范敬宜先生,一位能让人久久怀念的前辈……